



毛泽东与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 马 芮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合，经常领导学员深入开展革命实践。第六届农讲所开学后，恰逢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举行，毛泽东便组织学员到现场旁听，学习农民运动经验。6月，毛泽东率领全体学员冒雨参加了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的反帝示威游行。8月，他又组织学员到开展农民运动卓有成效的海丰县实习两周，调查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所思所想，学习开展农民运动的方法。据当时的刊物《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在将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农讲所如火如荼的开办，革命形势也在迅速发展。以广州农讲所为榜样举办的讲习所或农训班在全国有数十个，其中许多是广州农讲所教员或学员创办的。农讲所学员毕业后大多被派遣到各地农村，在他们的策动下，各省的农民协会纷纷组织起来，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对于农民运动的思考也越发深入，他在农讲所学员中组织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对拟定的租率、田赋、农民观念等36个项目展开深入调查。他把这些调查材料收录进自己编印的《农民问题丛刊》中，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革命人士参考。他还专门为该丛刊撰写了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在此时期对农民运动的一系列深入研究和实践，为此后他创造性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红色记忆

办学方式和实践

毛泽东非常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滚洪流之中，为推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历届农讲所中，第六届规模最大、招生范围最广、学习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

课程内容及讲授

第六届农讲所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政治训练与军事教育并重的办学方针。毛泽东精心挑选了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教员队伍，教员大多学习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而且多是熟悉中国社会和革命状况并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主要有萧楚女、彭湃、周恩来、阮啸仙、恽代英等，分别讲授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课程。此外林伯渠、陈延年、郭沫若、何香凝等也到农讲所作报告或演讲。

毛泽东精心设计了第六届农讲所的课程，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解、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分析以及对对中国革命基本知识的讲授。理论课时间为13周，共设有25门课程，主要内容为农民运动的革命理论与方法。

为了使学员毕业后能文能武，成为农民革命武装、农民自卫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农讲所学员军事训练时间则占全部课程的较大部分，达到了10周，学生学习各种战术动作，还到兵工厂进行实弹射击。

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3门课程，其中“中国农民问题”课程的授课时间最长。课上，他将自己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做成讲义，向学员作了专题讲授。为了把各个阶层的关系讲清楚，专门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多层塔，从塔基到塔顶，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等，自下而上逐个罗列出来，然后鼓励大家：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劳苦大众起来斗争，何愁“塔”不倒！指出要弄清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问题，深刻认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只有“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才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



石友不言 意蕴其中

□ 沈晓筱

“石友”是砚的雅称之一，明代艺术家陈继儒《妮古录》中称：“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中国古代文人对砚寄予了丰富的情感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器以载道”“以物言志”“文质彬彬”等思想观念与审美文化，在砚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研磨粮食或颜料的研磨器。由于早期使用的颜料、墨块大多为形状不规则的天然材料，所以早期研磨器往往还需要配以磨棒、磨块或磨杵，以组合形制出现。结合新石器时代陕西临潼姜寨遗址、西汉南越王墓等出土的实物，可以推断东汉以前颜料研磨器大多选取便利易得的石料，但也有玉器等特殊材料，殷墟妇好墓中就出土了玉质研磨朱砂用具一套。当然，这类组合形制的研磨器还是与后世之砚有所区别，宋代苏易简在其《文房四谱》中引用了《开元文字》对砚的释义“砚者，墨之器也”，强调了砚的产生与墨的密切联系。魏晋时期已经出现了制墨名家，说明人工制作的成形墨已然成熟，成形墨可以直接手持研磨，使得磨棒、磨块等逐渐失去作用，砚也自此真正诞生。

基于研磨的实际需要，人们自砚产生便开始探索各种适宜制砚的材料，宋代李石《续博物志》中讲“《砚谱》载天下之砚四十余品”，此应为当时名砚的种类，但若细数历代砚品，实远不止于此。砚可分石质砚和非石质砚两大类，其中石质砚根据

产地不同，又细分为端、歙、洮河、红丝等诸多名品；非石质砚中陶之属数量最多，澄泥砚、瓦砚、瓷砚等可归于陶之属，其他还有漆砂砚、玉砚、铁砚、水晶砚等各类材质，可谓品类繁多。古人甚爱评砚，从唐代柳公权论砚开始，产生了许多版本的“名砚排行榜”，至今如人们熟知的“四大名砚”。但评砚最根本的出发点正如明末清初孙承泽总结的“砚之用，发墨不损毫”，既要下墨快、发墨好，还要在舔笔时不伤笔毫。

因为砚材的品质有高下，所以佳砚难得。宋人编撰的《歙砚说》引用了一段龙尾石歙砚的轶事，龙尾石是南唐后主李煜最为喜爱的砚材，但一度断绝，直到宋景祐年间“校理钱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处。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工不可入。仙芝改其流，使由别道行，自是方能得之”。可见当年取龙尾石的诸多波折，甚至需要先使溪流改道以利开采。古代文人墨客也常以寻访名砚为人生乐事，北宋文学家黄庭坚曾亲访龙尾采石地，并写下长诗《砚山行》；北宋名相韩琦曾于相州帮友人找寻铜雀瓦砚，但极其不易，遂复诗《答陈舜俞，推官惠诗求全瓦古砚》称“鄆官废瓦埋荒草，取之为砚成坚好。求者如麻几百年，宜乎今日难搜讨”。铜雀瓦砚居然引孜孜以求百年之久，古人寻砚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砚的形制多样，作为一种文房用具，其形制设计也会体现不同时期文人的审美与品位。简洁造型有方形、

圆形，如《砚赞》所言“或薄或厚，乃圆乃方，方如地体，圆似天常”，可见大道至简，方圆造型取法于天地，无疑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砚中的体现；四面环水、视堂圆如璧的辟雍砚取法于周天子所设大学，汉代班固《白虎通义》载：“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故该砚形制寓意深远、极具伦理文化特征；龟形砚、虎符砚、蟾蜍砚、蕉叶砚、灵芝砚、竹节砚等仿生形砚则遵循取法于自然的原则，既有象征意义又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风字砚、菱花砚、八棱砚、抄手砚等仿古器型也一直是兴盛不衰的样式，可见“砚必宋唐”的好古摹古之风；随着制砚工艺的发展，砚的雕刻装饰日益精致，也出现了专为欣赏、把玩之用的艺术品砚，山水风景、花鸟虫鱼、历史典故、吉祥纹饰等皆可以入砚。但总体而言，正如宋代米芾《砚史》中强调的“器以用为功……则石理发墨为上，色次之，形制工拙，又其次，文藻缘饰。虽天然，失砚之用”。在中国用砚的历史中，纯粹的赏玩之砚始终不是主导，追求实用性、观赏性的平衡、实现功能与形式相协调的“文质彬彬”，才是制砚文化的主流。

古代文人爱砚、藏砚、品砚、赏砚，不仅留下了如《砚谱》《砚史》《砚笈》《云林石谱》等诸多专门著作，还常常为砚题刻砚铭，咏物、抒情、言志、鉴戒，不一而足。苏轼一生中题刻诸多砚铭，曾在一方端石海天砚背后刻砚铭32字，其中“匪以玩

物，维以观德”显有敦品励行的告诫之意；乾隆帝主持编撰的《钦定西清砚谱》中收录有一方乾隆藏玉带生砚为文天祥生前日用，上刻砚铭：“磨尔心之坚兮，寿吾文之传兮”，表达了主人借物咏志之意，此砚背刻乾隆铃印“比德”，饱含赞誉之意。砚也常被古人用来作为馈赠或家藏的传世宝物。欧阳修在其《砚谱》中说到虢州澄泥“独余尝得其二，一以赠刘原父，一余置中书阁中，尤以为宝也”，得到两方难得的澄泥砚佳品，自留一方，另一方则赠予了他的好友同时也是后辈的刘原父；《苏东坡全集》中收录《迈砚铭》一首，苏轼赠一方砚台，却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小小侧影，多样的材质、不同的造型，向世人呈现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书房文化与文人“寓意于物”的精神世界。砚及其承载的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将不断得到传承和发展。

案头桌角的一方砚台，却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小小侧影，多样的材质、不同的造型，向世人呈现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书房文化与文人“寓意于物”的精神世界。砚及其承载的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将不断得到传承和发展。



人间四月天，清明踏春时，与好友一行前往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的江西婺源寻春赏景。婺源北部屏障鄣公山上，一簇簇杜鹃花开得正艳正浓，与青山绿水相映衬，如霞光初升，如星火跃腾。

鄣公山，也称“三天子鄣山”，又名大鄣山，地处皖赣边界，属黄山余脉。主峰擂鼓尖犹如利剑直插云霄，俯瞰山川，是婺源县最高的山峰。鄣公山的自然环境保护得很好，山间的道路由青石板铺就，上行的台阶都是原木制造，沿途大部分房屋也都是木板架构。山谷间云蒸雾腾，树林中凉风习习、空气清新。行走其中，仿佛进入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山顶上有个鄣山村，据说在50年前曾为儿童红色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拍摄提供了不少素材，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上山的道路越来越陡峭，我们沿着悬崖绝壁间开凿出的蜿蜒山道向山顶攀登，两三个时辰后，云雾缭绕中一幅水墨丹青映入眼帘，这便是山顶上的鄣山村。柔和的阳光洒落在这古朴静谧的小村庄，家家小桥户户流水，古老的石板路环绕穿行，漫山的竹子隔绝了外界的喧嚣。鄣山村是婺源海拔最高的自然村，里村姓余、外村姓汪，少部分村里人姓谢。虽地处偏隅、山高谷深，但明清时期已初现茶市繁荣的景象，村民世代都是靠种茶制茶为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婺源是闽浙赣苏区的重要区域之一。鄣山村是一块浸染着革命烈士鲜血的红土地。在村尾尽头，青柏翠竹环抱簇拥中，屹立着一座高大的纪念馆，塔身正面书写着“革命烈士纪念馆”，侧面写有“鄣公山上红旗飘”的镏金大字，仿佛在述说着80多年前革命战争年代那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庄严肃穆中令人肃然起敬。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始长征。1935年初，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团北进失败，闽浙赣苏区斗争形势日趋艰险。4月，奉命返回皖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皖南红军独立团团长熊刚、政委刘毓标途经婺源，见鄣公山、茗荪山一带地形险要、山高林密，且当地群众有革命觉悟，认为是适宜开展革命斗争的好地方。按照闽浙赣省委指示，部队在鄣公山驻扎下来。1936年1月，中共婺源县县委在茗荪山成立。4月，中共皖浙赣省委在鄣公山成立，并在茗荪山成立皖赣特委。全面抗战爆发后，新四军皖浙赣支队部后方设在这里，同时在鄣山村附近的胡家山设立了红军后方医院。1937年3月下旬，根据地被敌人占据，各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被冲散，转入分散斗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艰苦卓绝，鄣公山的革命斗争正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绕纪念馆一周，看到背后立着10多块没有肖像的烈士墓碑，还有一块上写着“无名烈士墓”，这是为了缅怀开展游击战争牺牲的鄣山村人而立的。我们在碑前伫立了许久，向英雄致敬。在绵延群山中这不足千人的小村庄，竟长眠着这么多鲜为人知的英雄。村民余玉堂是皖南红军独立团在鄣公山一带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余玉堂幼时家贫，只读了几年私塾，后靠做短工维持贫苦生活。1931年他外出谋生，在上海遇到了中共地下党，听到了革命思想的宣传，深受启迪。1933年，红军游击队两次路过鄣公山，回到家乡的余玉堂积极响应红军号召，他带着红军走村串户，做群众工作。他对村里的穷弟兄们说：“我们穷人有出头日子了，现在中国出了一个为穷人的党，叫共产党！”1936年2月，余玉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鄣公山党支部书记。经

大山之巅的红色村庄

□ 赵坤 李茜

他介绍，鄣山村的茶农汪贺美、余洪祐、汪坤美、余日兴等一批热血青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红旗高高飘扬在鄣公山上。

1934年5月至1937年3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多次针对鄣公山的“围剿”行动。300余人的鄣山村，房屋多次被洗劫烧毁，数十人壮烈牺牲。面对敌人的凶残暴行，鄣山村群众没有屈服，反而更加坚强、更加团结一心地支持红军战斗。一次，敌人到这里烧山并搜捕红军战士，全村30多个青壮年闻讯飞速赶往红军棚，背起伤病员在山林里与敌人周旋，保护红军伤员得以安全转移。1936年8月，敌人先后3次逼迫鄣山村全部移居山下，企图将红军和当地百姓隔断开，围困红军队伍。被迫移居山下的鄣山村群众不断趁着上山砍柴的机会，冒着生命危险为山上红军送粮、送衣、送医药……他们说：“红军的命就是鄣山村人的命，保护红军就是保护鄣山！”1937年3月，因叛徒出卖，余玉堂不幸被捕，不久在安徽宁国县城英勇就义。汪贺美、汪林美、汪招美、余源发、余兴顺、余洪福……数十位正值青春年华的鄣山儿女为了革命事业，相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未能留下。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在鄣山村战斗过的“驱寇队队长”倪南山将军始终心系鄣山村，他称自己为“老鄣山”“鄣山之子”，一有机会，他便回来看望老乡亲。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将军的关怀、提议下，政府拨款，一条长达16.8公里的鄣山公路通到了鄣山顶，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的生产生活。现如今，在海拔千米的高山上，鄣山村又新开发了200多亩有机茶园。鄣山有机茶承载着鄣山人的希望与梦想走出了大山，美名远扬。鄣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

江西处处见青山，青山处处埋忠骨。青山无言，默默追思着那段红色的历史；青山有幸，硝烟散尽后，昔日英雄长眠的山村，早已换作春和景明。凭借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鄣山村不断擦亮红色名片，一幅红色旅游带动乡村振兴发展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